

## 歐洲左派的美國化

在一本 1998 年出版的書中，一位有名的社會學家斷言：「資本主義沒有其他的替代選擇。」這個論點保有了對管控與規範資本主義應當採取何種方式的以及要介入到何種程度的關心。讓這個論點突顯其重要性的推手是 Anthony Giddens，他也是英國首相暨工黨黨魁布萊爾的導師。經由擁抱「第三條路線」（書名）作為一條避免左派反資本主義以及右派保守主義的中間路線，布萊爾終止了由社會學家所主導長達一世紀的歐洲左傾。經此，他和他在歐陸的對手也促進了相似於美國經驗的歐洲政黨分化的進程。而在美國，社會主義並未搶到灘頭堡。

19 世紀晚期社會學理論家為「何以美國在工業社會中孤立、缺乏重要的社會運動以及勞動政黨」而感到迷惑，恩格斯在他人生中的最後十年試著去回答這個問題。1906 年德國社會學家 Werner Sombart 在這個主題上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書籍「何以美國沒有社會主義？(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S?)」，同年費邊社的 H.G. Wells 也在「美國的未來(The Future in America)」提出這個問題。Lenin 與 Trotsky 也很關心該現象，因為它（指這現象）懷疑了馬克斯主義者的歷史物質主義的內在邏輯。此論點由馬克思本人在「Das Kapital」書中表述，在此他陳述：「在經濟方面上較有發展的國家對於未來願景的圖像呈現出較少的發展。」從 19 世紀的最後 25 年開始，美國已然成為這樣的國家。

套一句馬克思的名言：「領導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馬克思主義者相信大多數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將帶領世界邁向社會主義的國度」，此立論在馬克思主義中確立。而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成為最有力的修正主義者之前）Edward Bernstein 指出：「我們看到當代社會主義進入且深耕於美國，此與資本主義的傳播與無產階級的出現有直接相關。」1902 年，德國社民黨的領導學者 Karl Kautsky 寫出：「美國揭示出我們的未來，在一個國家的範圍內可以顯現出來。」他於 1910 詳盡地闡述此看法，預期過期的階級衝突激化將在美國強而有力地成形，甚於其他國家。德國社民黨的黨魁 August Bebel 於 1907 年明確地指出：「美國將是首先迎接社會主義共和國到來的國家。」這個信念在當時德國政黨多由一個大型社會運動加上國會議員推波助瀾的狀況下產生。而美國社會主義政黨得到少於 2% 的選票，是基於美國在工業發展上超出德國甚多的事實。

社會學者持續在美國無力創造一個可實行的運動是假定「社會上有超結構的存在」之學者最困窘之處，而這超結構圍繞著政治行為，是個構成經濟與科技系統的基礎。Max Beer 他致力於國際社會主義研究達 50 年之久，研究遍及奧地利、英國、德國的政黨，他描述出由歐陸馬克思主義領導者初步討論之下所提出的有關於美國社會主義衰弱的焦慮，他們瞭解到這是馬克思主義現有的矛盾，且這也引出關於馬克思主義效用的問題。

在 1939 年發行給美國大眾的出版品中，Leon Trotsky 轉載「Das Kapital」的句子，只爲了用評論去駁除它：「這個絕不可能被如實地採用！」Trotsky 瞭解他的馬克思主義且也明白在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美國理當是第一個需要理論（來支援的國家）。他的評論暗示著他內心的衝突。他祛除象徵性陳述的努力指出他對這揭示的難題沒有任何的解答。

但雖有美國組織化社會主義不光彩的記錄，可能引起爭論的是，在這層認知上，馬克思於說明大部分的已開發國家的願景展望上仍有待開發（開發不足）的論點是正確的。美國政治文化，隨著它確實地發展，並不如馬克思所希望的，反映出經濟上、科技上進步的邏輯，絕無封建的美國已然是中產階級社會的原型。就 Max Weber 所認知，美國恰好是世界上最具有生產力的經濟體，因爲它的文化徹底地圍繞在資本主義的價值中。理想典型的資本主義人是 Benjamin Franklin，對 Weber 而言，資本主義的精神在賓州文件（Pennsylvanian's writing）上有最好的表述。

美國非社會主義者證明是歐洲左派的典型之爭論在 1940 年代由 Lewis Corey 所提出，他是美國共黨的早期領導者，見於 Workers Age 刊物中，Harvard Klehr 概述 Corey 的洞察如下：

「除了成爲一個例外之外，美國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典型，只有種族的方面有了改變，歐洲社會主義學者可以預見美國不快樂的社會圖像。在值得一探的角色轉換上，就是現在歐洲社會主義者可以望向海的另一端，看到他們自己（發動的）運動的未來。美國的發展與歐洲並無二致，它僅僅是處於一個比較進步的階段。」

### 改變中的社會，改變中的政治

如同 Corey 所預期，在其他西方民主的左派漸漸成爲像是美國非社會主義者的左派立場。較少或較大程度上，所有左派的主要政黨現今拒斥中央集權之經濟，並且接受競爭市場作爲達到提升經濟成長以及提升生活水準的方式。社會民主政體以及勞工政黨現今也有社會主義上以及意識型態上的多元。國際社會主義

（Socialist International）有效地在進步政黨中的嶄新聚合中變換角色，是爲「第三條路」，代表美國的民主黨。

這個歐洲政黨角色的轉變反映了經濟以及階級結構的改造，而使他們與美國的體制有相像之處，這些基於過去封建與帝王時代已修正的、清楚的等級式階級社會之強調已有大幅度的衰退。歐洲經濟的成長伴隨著商品的消費以及較公平的教育

配置。相當幅度地減少生活形態的差異包括存在於社會階級中的口音、衣著。這些收入的分配以及職業技能改變了過往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金字塔型分配，變成中間凸起類似鑽石形狀的分佈。

左派政治團體尋求去吸引更多在成長中的中間社會階層甚於基層工業員工以及促成人口比例下降的貧窮者。在美國這個工業化社會的原型中，那些從事非手工業的受雇者比例從 1960 年的 43% 增加至 20 世紀末的 58%，而從事製造業工人的比例則從 26% 掉至 16%。英國也有同樣的情形，從 36% 降至 19%。瑞典則是從 32% 降至 19%，在荷蘭則是從 30% 掉至 19%，澳洲也是從 26% 掉至 13.5%。而在法國以及德國雖然沒有戲劇性的降幅，但也頗為明顯，分別是從 28% 降至 20%，從 34% 跌至 29%。

美國相對於歐洲社會而言較少強調階級意識以及組織，在大西洋的西岸也有相同的下降傾向。協會會員數是左派政黨的顯著基礎，這些會員國在國際勞動組織的 92 國調查中，有 4/5 呈現下降的趨勢。1985 年至 1990 年之間，協會會員數的比例於美國下降至 21%，2000 年只有 13.5% 的美國受雇工人。在這之中，私人受雇的比例則少於 10% 是貿易聯盟的成員，這種下降的趨勢在法國以及英國尤為明顯，分別是 37% 與 28%，而德國則降至 18%。歐洲與澳紐的社會民主黨就像是美國的民主黨，在成員上以及支持上具有社會性的同質。就投票與階級的相互關係來看，美國比起其他工業化國家來得低，且在近 10 年於大部分的已開發國家也下降。

一些促成這些發展的潛在力量被許多新馬克思主義社科家在討論「後工業社會」、「後物質主義」、「科學與科技革命」之出現的脈絡上所確立。社會民主主義者 Daniel Bell 是西方國家中為這些改變概念化的主要人物。Radovan Richta 以及他在捷克科學學院的夥伴們也闡述了東歐與蘇聯相似的發展。

在已開發社會之後的階級與「政治關係」之改變，頗類似歐美的左翼政治，可能在非關政治的馬克思主義架構中被分析，也就是說，接受「科技進展與經濟階級的分配決定了政治與文化的『超結構』(superstructure)」的論點，但排卻了社會主義將會超越資本主義的假定。許多被馬克思所預期的趨勢：工廠的成長、工業社會中無產階級穩定的收入、自營業比例的下降等都已終結。人們受雇於第三波科技化以及服務業的比例成長迅速，許多大學畢業生以及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也有迅速的成長，法國社會學家之領導以及左派知識份子 Alain Touraine 提出由於以下的發展權力基礎已改變：如果之前的領導階級的判準是財產，那麼新的領導階級的判準則是由知識以及特定的教育層級所決定。

新馬克思主義者與科技決定論者強調理論以及科學知識的範圍成為社會以及經

濟變遷之主要的源頭，改變了社會結構、價值、習俗，在方式上賦予科學與科技菁英可觀的名聲與權力。後工業主義下出現的社會階層，他們根據在大學中、在科學與科技世界中，工業由電腦、公共部門以及專業所孕育而成，發展出他獨特的價值。

當代後工業主義中最重要的實證分析者 Ronald Inglehart 指出後物質主義者價值的改變以及階級衝突的下降也是最後半世紀逐漸成長的氛圍所帶來的功能，在 20 世紀後 50 年間由年齡所建構的世代保有了對比他們前一代所擁有的不同的價值，它被建立在經濟上的稀少性氣氛以及經歷過嚴苛的經濟衰退的背景上。由 Inglehart 過去 1/4 世紀所收集的調查資料顯示「清晰的世代效應」以及「讓高科技與科學追求的擴張成爲可能」和「教育成就大規模的成長」之連結。

這些發展深遠地影響了工業進步社會的政治景象，隨著經濟場域上市場力量的成長，後工業政治以國家角色上意識型態衝突下降爲特徵，接受較佳教育的公民逐漸關注起非經濟與社會議題，如環境、健康、教育品質、文化、女性以及少數更佳的平等權、民主化的程度、國內與國外的自由以及個人道德問題，特別是家務事、性行爲這方面。在一些政體中，包括法國、德國，在環境改革者的帶領下組成了新的綠色政黨，通常他們與新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結盟。

隨著美國建立起較不具中央集權的特質的模型，許多市場導向的政體近來都成了後物質主義新政治的先驅，這股潮流的傳遞可以說是從柏克萊與麥迪遜至巴黎與柏林。法國政治分析家 Jean-François Revel 在 1970 年代早期的著作指陳不論是在歐洲還是他地，較新形式的抗議運動都是美國原型的仿製品。

許多認知到在他們國家左派在起的政治分析家並不瞭解這些變遷的發展程度，而這些發展普遍上由經濟進步的民主政體所達成。爲了指出這些事件的影響層面的廣度與一致性，我將總結在國家採取美國途徑後這些國家的左翼政治的方式，這並非是指政黨與意識型態在國家民族主義尚有相同的交互性，有許多不同的變項反映了不同的歷史背景、不同的政治裂痕以及結構與統計模式的差異。但就政體而言也有可觀的相似性，就如布萊爾所強調，如果我們瞭解這世界上有普遍的發展，它是個相當健康的事物。

### 新社會民主主義者

歐洲社會主義領導者在 1998 年 9 月 24 日於美國紐約與柯林頓會晤後，布萊爾宣布第三條路的信條，在經濟上，我們的方式並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一國干預，政府的角色是去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稅制以及福利政策去促進獨立而非互依，經由改善教育與內部結構使人民有能力去工作，並提升其事業心。我們能夠

獲得商業領導者以及貿易聯盟的支持而感到驕傲，在福利以及受雇政策上第三條路意指改革福利去另闢可能的工作機會，他在就業上促進公平標準的產生，而且經由減稅以及不鼓勵就業的處罰與創造就業機會去產出工作報酬。

1997 年的英國大選，在工黨拒絕歷史上對公共所有權的強調，終結了一世紀以來的社會主義減少私人所有權或是完全根除的努力後贏得大選。布萊爾刻意強調他同意自由市場與柯林頓的小政府政策，甚至在柯林頓之前，布萊爾就已宣布大政府時代的結束，並允諾中心化治理。布萊爾再次塑造他的政黨形象，將之視為「新工黨」，是個不認可去與貿易聯盟共事的非社會主義政黨。他強調他希望聯盟能與管理階層合作去確保英國工業是具有競爭力的，布萊爾的意識型態擁護者 Peter Mendelson 驕傲地宣稱工黨現在是個市場資本主義政黨。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 *New Statesman* 裡 1994 年文章中布萊爾對勞動組織的勸告指出，站在一個聯盟的最佳利益出發點上不要去與單一政黨協商，布萊爾提出聯盟應當可以在政府任何的變遷或是一成不變下興盛，而這是源自於一個有較大部分的由貿易聯盟所創立，且在它的歷史中由他們所補助其發展的政黨之領導者。在 1997 年選舉中，工黨揭示了一個專注於商業允諾的宣示，他指出布萊爾政府將維持聯盟中 Margaret Thatcher 的限制，並且抵制不合理的經濟需求。布萊爾在一次會談中標示著他的行政政策將讓英國勞動法律在西方世界中是最為限制貿易聯盟主義的法律。

工黨宣示歲入以及支出將被儲蓄以及投資所取代，它的普遍選舉政見不只基於「健康利潤是活力充沛的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也強調低通膨的目標需要確保工資的獲得。據此 Baroness Thatcher 在 97 年大選一開始所說：「英國將在布萊爾先生的掌理之下安全無虞。」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談到國際社會主義者的會議，布萊爾回歸妥協，說道：「1980 年代有些特定事情是正確的：強調事業、更有彈性的勞動市場。」他其中一個首要行動是從財政部到英國銀行間的轉換去控制貨幣政策與利率，另一方面則是接續他在 1997 年 5 月 31 日與柯林頓的會面，推動設計去減少失業津貼的改革，即敦促單親媽媽們去就業。在這次會議中，布萊爾與柯林頓斷言，今日的進步政黨是負有財經責任以及審慎執行的政黨。

同樣的模式在世界上各個角落顯而易見，在 1980 年代澳紐的勞工政府削減了所得稅，力求解開經濟上的管制並且推行產業民營化。澳洲工黨與貿易聯盟訂立協約致使首相 Robert Hawke 領導的政府 8 年來實質工資減少 1%。紐西蘭也有相似的境遇，在 1984~1990 年間工黨終結了根據能力賦稅的傳統，福利國家概念崩解，且公營事業民營化，根據社會主義雜誌的報導，首相 David Lange 聲稱社會主義者必須接受經濟上的不平等的存在，因為它是驅動經濟前進的引擎。

相同的模式也在英語世界國家中外的左派政黨所維持，瑞典社民黨轉換了他們先前的工資成長、高所得稅以及鮮明的福利國家導向，並從事許多民營化措施。晚近美國社會主義領導者 Michael Harrington 嚴厲地報導 Olof Palme 政府經由減少工作實質收入去增加就業。

在西班牙第三任社民黨首相 Felipe González 轉換了他的政黨（後佛朗哥時代初級階段的馬克斯主義者）變成私有化、自由市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支持者。他曾經表明：「在近似邱吉爾式的建制中，有競爭性的自由市場經濟是以貪婪、腐敗、弱者為強者剝削為特徵，但資本主義是現存最不壞的經濟系統。」「經濟學人」雜誌描述了他的經濟政策是已經使他的領導的政府看起來有點像是 Thatcher 的權利。

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主要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德國社民黨，在 1959 年 Bad Godesberg 的會議中拒絕了馬克思主義，美國政治科學家 Russell Dalton 之後評論了社民黨的方案：「馬克思將會非常驚訝地見識到自由經濟競爭是社會民主經濟政策中的一個必要條件。」談到 1976 年社民黨首相 Helmut Schmidt 主張工人的利益需要擴張的利潤，今日企業的利潤並非是明日的投資，而明日的投資是為來了日的雇用。1990 年社民黨的方案指出古典自由潮流伴隨著民主化的建制，市場與競爭是不可或缺的。1995 年社民黨首相候選人 Rudolph Scharping 時任防禦部的部長，強調他的政黨的歷史性的假定證明是錯誤的，他說：「我們社民黨創造了過度的管制，過度的官僚以及過度專業化的福利國家。」

1998 年選舉出來的德國總理 Gerhard Schröder 延續了這個傳統，在他看來，社民黨並非是左派的一部分，而是佔據著新中間路線，這是個如 John Vinocur 所言，用了「風險」、「企業精神」以及「彈性勞動市場」等語彙與表達社會正義、公平收入分配的效忠一致。Gerhard Schröder 允諾改革德國的經濟，並且透過降低「禁止勞動開支」以及「提供新的資本投資誘因」去降低失業率，他指明社會民主黨打破了國家計畫式經濟的社會民主態度，我們了解到全能的干涉主義國家在當前的環境中並沒有著力點。

在 1998 年 11 月 10 日他就任總理後，於其就職演說 Gerhard Schröder 強調將與即將接續卸任的 Helmut Kohl 政府的連續性，言道：「我們不想要做任何標新立異之舉，但是許多事情將會更好。」為了幫助減少失業，他將 Kohl 時代最高 47% 的法人稅降至 35%，並且要求商業以及聯盟在（尋求工作機會上的）正式聯盟合作。他也主張促進個人退休金方案，去鼓勵私人責任、集中國家津貼並且把錢用在刀口上，同時，如雜誌 Financial Times 所言，在供給面上結合財經政策，包括解除管制、開放市場等。

在過去社會主義政黨創造了以穩定比例的 GDP 為前提的社福國家(且這 GDP 比例有時過半)去組成政府，而今日這些同質政黨體認到他們不可能在世界市場下競爭，除非他們減少政府的支出，他們的選舉境況促使他們去訴求中產階級以及有豐富技術的勞工和高科技員工的支持。因此像布萊爾、柯林頓、Gerhard Schröder 他們尋求較低的賦稅，減少福利資格、並平衡他們的預算，也去強調專注於自然、社會、經濟環境等後物質主義的改革。甚至在瑞典這個社會民主主義的原型，在 1991 年透過私有化附加的 25 個企業，加快它的步調去增強其經濟。芬蘭和丹麥在社會民主的領導者要求下也追求相似的政策目標。

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中，唯一移除國家干預的例子發生在挪威，且在某種程度上，法國與挪威仍然偏愛廣泛的福利政策(雖無，在國營企業上它也應被重視)。挪威由於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可以因應福利國家支出，所以可以保有舊式社會主義的概念。法國左派在社會中實施對國家有強烈性指導的原則，跟美國將反國家中央集權作為國家的一部分相當。法國的右派與左派認可一個有權的國家、一種回歸帝國時代、革命時期與王制的強調。新聞記者 Roger Cohen 指出戴高樂派者附著於國家中以及拒絕市場改革促使社會主義者更加貼近左翼，且區分自我。就法國政治的學院權威 Ezra Suleiman 所強調：權力不能在國家之中被釋放，所以左派仍是左派。因此 1997 年社會主義者允諾政府贊助提供就業機會的大規模方案以及維護福利國家免於預算刪減而贏得選戰。

但在 Le Nouvel Observateur 的訪問中，法國社會主義總理 Lionel Jospin 就像其他歐洲社會主義學者一般，在許多的去中央化以及增加的個人主動性上，言談中他贊同脫離中央集權的國家統治。Lionel Jospin 他提到法國效法美國經濟的需求，在 1998 年他批評左派份子鄙視美國就業成長的程度，說：「相對於我們所聲稱以及我們所深深信任的，在美國所創造的工作不僅是，甚至主要是低薪、沒前途的工作，但也有服務上頗具技術性與高科技的工業。」根據經濟學人的報導，Lionel Jospin 強調法國可以在美國的經濟動力上學到很多，特別是在它的研究與革新的活力、它具競爭性的精神以及更新的能力方面上。

讓人好奇的是，1990 年代晚期的國家模型經常被歐洲社會民主主義者所援引的是荷蘭的例子，逾 1997 年失業率高達 6.5 % (比一般大陸型經濟還低許多)及失業成長率比英法德還高，荷蘭在前任工黨領導者 Wim Kok 領導下，降低了工資、通貨膨脹與利率，並且簡化了了雇用以及解雇的規定且開展新的商業。失業帶來的利益被削減，而生病者以及身心障礙者請領補貼的資格變嚴格，紐約時報的 Thomas Friedman 說這種政策是美國樣版的小型化、私人化、勞動規則的鬆綁。

在由聯盟所協商的「社會協約」，其後由 Kok 領導，雇主與勞工同意每年限制工資 2% 的成長，是否因為這些政策，隨後的接近全部就業的經濟導致收入不均的

情形增加，更甚於美國以及其他工業國家。在高科技經濟中，受過良好教育以及高技能者比工業化時期的工人及未有較多技術者更重要，而因此他們薪水相對地高。

除卻具有政治性背景的美國和較有進步思維領導的歐洲，舊世界的左派已然成爲較爲類似美國的左派，就如 Lewis Corey 所預期，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政治的脈絡下美國展現了未來的圖像，隨著歐洲國家生產及大眾消費的達到新高，他們如 Antonio Gramsci 所預期，去模仿美國，同時有較少的階層化社會、較少以狀態（status-bound）爲基礎以及社會大眾普遍接受的過良好教育，其後促使他們的優勢層級與過去相比有較少的階級意識。今天正如 Adam Przeworski 所說歐洲現代非社會主義進步黨尋求的是讓資本主義更具人性、更有效率，就如 François Mitterrand 先前的指導教授 Regis Debray 所著重的，歐洲社會主義領導者的目標是實踐右派的政治，但在態度上更爲理性、明智。

### 舊用語新定義

沒有一個意思要去提倡在現代民主上做政治上的劃分，自從法國大革命所概念化的左右兩派的光譜已經消失，民主黨、共和黨、社民黨、保守黨仍是在投票上提供選擇，雖然他們意識型態上的承載以及內部的黨派仍在變遷。連結到社會層化的裂痕不再與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地位光譜有相關（即社會層化與政治上的左右派無關），包含道德、墮胎、家庭價值、公民權、性別平等、多元文化主義、移民、犯罪、對外政策以及超越國家層次的共同體，個人與團體在方向上是獨立於他們的社經地位，但大部分這些事情可以與社會意識型態相關，且也與宗教與教育有關連。

左派與右派的意義在改變，就如我們所見，左派的政黨雖然仍在找尋自己的定位，是爲社會民主黨或爲社會主義政黨。左派政黨也廣泛地再度建構自我爲美國式的自由主義，強調後物質主義的主題包括環境主義、女性平等、同性戀議題、少數權利、文化自由等。權利在不同的程度上已然變遷，成爲古典自由主義或自由主義。左派強調群體的平等與經濟安全、權利、機會的平等（和國家權力的衰退）。在邏輯上，右派也支持個人自由，沿襲著 19 世紀自由主義者的鍾愛，但是經濟保守派以及宗教上的傳統主義者結盟在有關稅制、家庭、生活方式等議題上推動文化的保守主義改革，在政治分裂結構給定複雜的變項，今天想要去確立一個區分左右派的一貫模式是困難的。

沒有主要的傾向，左派或右派保有了對烏托邦的信念，一個透過戲劇性、重新建構的社會與政體針對所有主要問題的解決之道，這些後冷戰條件期待著民主上的穩定以及國際間的和平。民主並不是從事反對彼此的戰爭，這已然成爲自明之



理，且現今大部分的世界是民主國度，當極端主義運動以及政黨存在，他們的勢力幾乎都相對地弱，至少在西方是如此。最強的是奧地利的 Jörg Haider 的自由黨，有 27% 的得票率以及法國的 Jean-Marie Le Pen 的民族前線，有 15% 選民的支持。沒有其他的政黨可以接近這種程度，因為沒有魅力型領導者且政治熱情較少，年輕人如亞里斯多德所陳述，變得較有自己的想法，且他們寧願做高貴之事甚於有用之事，都將不可避免地受挫。

這個情境將會改變嗎？當然會。經濟以及其後的社會絕不會在一個穩定的國家保留著，市場系統的內部動力在商業圈中產生回捲，而這可能威脅到民主的穩定。日本的崩頹替代了該國的危機，法國 1997 年的左傾以及 Le Pen 的支持被國家中央計畫主義者以及 12% 失業率所催化，人口因素的威脅侵蝕了社會安全與健康系統的財政支撐。在國際場域中新選手的興起，如中國，可以且將會導致貿易上的不平衡，但是所有這些願景都是針對未來而言。

現在，冷戰的結束似乎給予美國及其意識型態一個完全的勝利，美國現今是超級強權，它的經濟是最有生產力的，它近來對平等主義式的社會變遷所努力的主要運動以及爲了改變生活品質如女性主義、環境主義、少數群體的公民權、同性戀權利等全都由美國散播。尤其是隨著 19 世紀的民主革命這段期間，已開發的世界在滿足工人、知識階層的消費需求方面上比過去還成功。

所有的這些應爲保守且沾沾自喜的社會所設置，但是西方國家評斷自己的標準都是源自於法國、美國以及馬克思革命教條，這些國家宣稱「人皆生而平等」以及分享「生活、自由與追求快樂」的目標，但所有的政體，甚至是古典自由主義者必須在完全維持自由主義與平等主義固有的烏托邦目標上宣告失敗。美國人仍然靠向自由主義的那一邊，歐洲則是側重平等主義，這兩種取向都喜愛自由，爲此去設置有利的司法建制去規範國家權力。美國人在一個有效率且權弱的政府中喜愛實才實能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的社會。他們在一些絕對的思維上將不會達成這目標，它可能被馬克思、恩格斯、Antonio Gramsci、Anthony Crosland 以及 Michael Harrington 等社會主義者所標示，這些人都認可美國在他們的無階級社會意識型態目標上朝社會化發展（雖明顯，但非在經濟層面上），在他們一生的認知中這個意識型態的目標伴著較弱的國家甚於其他系統。美國左翼馬克思主義者 Leon Samson 歸結了 1930 年代早期美國的基進派不能對信任他們已經住在一個操作化的社會（雖然明顯，但未反映在用詞上）的人們販售社會主義，而它也被承諾是社會主義的目標。

美國仍然有其意識型態的視野，並利用它去驅動年輕人，歐洲逐漸地去承諾一個相似的社會視野，源自於法國大革命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大型措施，這些都接受競爭性的市場作爲一種增加生產力、減少與階級連結的消費型態的差異，他們也

擴大高等教育的範圍，其後使得進入菁英階級的途徑增加。在歐洲，強調地位的差異正在下降中，經濟上的不平等仍明顯，甚至在科技革新的時期增加，如同現在的情形，因為新的技能需求比過去要來得多。但是自從差異模式以及社會階級弱勢的下降，而資訊管道隨著網路的普及而拓寬，權力變得更加分散。

這些深遠的社會、經濟變遷將會在接下來的 10 年間重新形塑政黨分裂的本質，無疑地現在在方式上無法完全預期，但根據布萊爾與柯林頓掌政現代大政府時代已然終結，所以左派先驅政黨的進化終結了以階級作為構成政黨政治的主要裂痕。在先進的工業化民主社會中的政黨將持續地在左右光譜上找尋定位，但左右將不會再次作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抗。隨著廣泛的意識型態競爭的終止，政黨的差異被縮小且具有彈性，今天大部分的政黨在經濟議題上往中間路線靠攏，而政黨系統在尋求新的切割線上浮動著，為新的分際界定的社會基礎可能不會亦短時間內出現。